

《守道1957》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守道1957》

13位ISBN编号：9787208109476

10位ISBN编号：7208109478

出版时间：2012-11-1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赵修义,张翼星

页数：69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前言

前言1957年1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发起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已经过去了55年。时间流逝，光阴不再。会上活跃的老一辈学者大都已经离世，当时年轻的参与者也都进入耄耋之年。环顾今天中国的哲学界，已经沧海桑田。当年争得面红耳赤的那些问题，似已少有关注。如今，为什么还要重新端出这一段往事，将当时的历史资料（包括当时的报道，档案中保存的有关原始资料，参与讨论的论文和会上的发言稿以及在海外发现的资料）重新编纂并加以回顾和反思呢？因为，这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在新中国成立早期30年中，实在是太难得、太重要了。然而现在几近被遗忘。我们觉得有一份责任，让这个如此重要的会议不致被岁月所湮没。之所以说是难得，是因为，30年间，中国的学术（尤其是哲学）一直处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之中，批判连绵不断。高层定调，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而且都是紧密地与政治运动联结在一起。学术（尤其是哲学的批判）有的时候是运动的前奏，有的时候就是运动的主题，有的时候是一个外壳，有的时候则是政治运动的深化和延伸。那些学养丰厚的学术大家，或是缄默，或是成为批判的对象，或是被迫作出各种各样的违心的自我批判。讲真话，就真问题进行自由的讨论，彼此诘问，互相切磋，几乎绝迹。唯有这次座谈会，如当时主持哲学系工作、这次会议的主要筹办者之一的汪子嵩先生所说是“建国后近30年中仅有的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争鸣的讨论会”。这次会议可以说是群贤毕至。不仅会议的主角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等一群原本建有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大家坦陈自己的见解，而且革命时代就开始学术生涯的顶级马克思主义学者胡绳、潘梓年、于光远、艾思奇等积极参与讨论。不仅如此，那个时代的各个不同学科的许多资深学问家如朱谦之、朱光潜、金克木等都参与争辩，在此后举办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上，何思敬、侯外庐、吕振羽等著名学者也应邀与会并踊跃发言。可以说当代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名家大多都在这次大讨论中现身，坦陈自己的见解。还有更多学养深厚的中青年学者，甚至一些在读学生也参与讨论并发表文章提出自己的各种见解。这是30年间唯一一次名家荟萃，老中青学者参与，气氛活跃，畅所欲言又向全社会广泛传播的一次学术会议。确属难得。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再也没能重现。既是难得，就没有理由不去追问一下，这难得的机会是如何得来的？后来又为什么不能再现？翻翻历史就可以看到，这次座谈会是1956年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仅有的两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之一（另一次是自然科学界的遗传学座谈会）。两个会议的主旨都是要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高层力图向思想界学术界表明执行这一方针的决心和诚意。学术界则将其作为“百家争鸣”的方针的一次尝试。高层对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重视，只要从《人民日报》在1956年的10月到1957年的5月初之间，连续发表与会议论题相关的大块文章以及对于会议的非常密集的报道就可以说明。1957年3月冯友兰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将这次座谈会作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例证，被《人民日报》用《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冯友兰批判对这一政策的各种怀疑论调》这样醒目的大标题全文刊发。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场百家争鸣的试验，是高层用于向全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学术界表明“春天来了”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此次会议在国际上也有影响，会后，汪子嵩先生应邀给在华的苏联专家介绍会议的情况，专家们都饶有兴趣。顾红亮先生在哈佛大学档案中发现的当时美国哲学家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通信，也可视为一个佐证。但是，1957年夏季风云突变之后，这次会议就遭到了清算。1958年初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组组长的关锋挑头对这次会议进行大肆抨击，给座谈会扣上了“哲学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的大帽子，嗣后在各大大学的“拔白旗”运动中，将这次会议以及会上活跃的一些学者作为重点的批判对象，大张挞伐，如冯友兰的言论被斥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并在报刊上广为传布。这一大转折，不仅标志着整个学术生态的改变，而且也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短暂的“春天”已经告终。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在当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所具有的标志性的意义。总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学术界的一件大事。综观这三十年的学术史，更加难得的是，在这么一个短暂的“春天”里，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活跃于会前、会上、会后的大学问家们，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么一个短暂的瞬间，展示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会前哲学系主任郑昕先生发表了《开放唯心主义》一文，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坦诚地说出了老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内心的困惑和对于学术自由的殷切期望。1956年下半年，北大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许多教师多次讨论了教学和研究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惑，冯友兰、朱伯崑等还著文在报刊上发表。据当时筹办会务的方昕先生的回忆，正是在教师们群策群力的推动下，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北大哲学系领导决定向中宣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相当于现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主管部门申请发起一次全国性大型座谈会，得到了潘梓年、胡绳、于光远、李正

文等负责干部的热情的支持。可见这次会议与完全由上层发起的遗传学会议不同，是知识界在“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之后，主动争取到的一次机会。没有这种主动的争取，机会也许就转瞬即逝。读读汇集了会上会后发表的文章的《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和有关的系列报道，我们就会领略到围绕当时的争论焦点所开展的“两论相订”中，学界的前辈是如何在这难得的有限的“自由争鸣”中，力现自己的文化担当，展示自由之思考和独立之人格，这一真正的学人不可或缺的风骨。如果再放到那个刚刚经历过多次严酷的批判运动的具体情境下，就会发现，这是何等的非凡不易。徐梵澄先生在谈到此次会议的主角之一贺麟先生时曾经说过，“贺麟是风云守道，有风云之气，但仍守道；我是守道而已”。也许“守道”就是这次座谈会的精神的集中体现。固然，在当时的情境下，“守道”的方式如梵澄先生所示，会各不相同。此外，许多学者在急剧的社会转变面前，还有许多困惑还在苦苦地寻道、问道。也正因为这样，呈现出多种的色彩。我们编纂本书，不是想逐个重评当时与会者的发言，而是透过这个典型的学术案例，同大家一起追思当代中国学者的“守道”历程。在当时一些人看来，坚守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就是“守道”，然而事实证明，其守的不过是教条主义的陈词滥调。相反，质疑、批驳这一戒律的言论倒是体现了为学之道。经历了时间的检验之后，可以看出求实求真，独立思考，勇于探讨，敢于坚持，不畏权势，平等对话，以理服人，才是坚持“双百方针”的学术争鸣之道，为学之道。已故哲学家冯契先生在其《近代中国哲学的革命进程》的“后记”中曾经谈到，自己与已经逝去的时代的思想家是“精神相通、血脉相连”，非常亲切，非常亲密。正因为这样，对于他们就有一种同情的了解，而学术的“意蕴（意义和意味）正是因为有同情的了解才能充分揭示出来”。我们这一辈学人对于活跃于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的先贤，也是“精神相通、血脉相连”的，既有一份亲切，也有同情的了解。每每重读会议的材料都有新的感悟、发现和心得。所以在编纂和重刊会议的实录的同时，本书除了汇集已经发表的回忆和分析的文章之外，还邀集了一些学人写了一些回顾和反思的文稿，作为全书的第三部分。令我们格外兴奋的是，一批比我们年轻的学者也热情地回应了我们的邀请，撰写了研究这次会议的文章，不仅为我们了解这次会议情况提供了许多独到的视角和新鲜的资料，而且也展示了新一代学者对此次会议精神的感悟。相信具有不同阅历，不同学科背景和关注点的学界同仁，面对这座值得发掘的精神富矿，一定还会有许多新的感受和发现。六十多年的历史进程表明，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确系当代中国哲学演进历史中异乎寻常的一件大事。1949年之后，哲学一直处在政治运动的漩涡之中，不断进行的意识形态批判中，凡是被批判的对象（无论是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胡适、胡风、梁漱溟……）都统统被归结到“反动的唯心主义”。其理论的依据最直接最集中的就是从1940年代后期就从苏联译译过来的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而这次会议尽管是一次中国哲学史问题的讨论，但是重点在方法论，聚焦于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到底是否正确。会上冯友兰、贺麟等众多学者对日丹诺夫定义的质疑，对哲学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的批判，无疑是一大突破。而1958年之后，这些质疑都被扣上了哲学“修正主义”的大帽子，整个哲学界又重新复归到以前的状态。嗣后尽管也有过一些讨论，但都是在这样一个大框架下进行，而且变本加厉，把党内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也都一一归结于唯心主义。可见这次会议的命运实际上预示了后来中国哲学的走向。不过此次座谈会对于日丹诺夫定义的质疑，尽管昙花一现，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就消极的方面来说，座谈会遭到的全面清算，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此后20年间中国哲学的命运。但是也不是说一点积极的东西也没有留下，1978年之后，日丹诺夫定义迅速失去市场，就得益于这次会议。此外，正像会议总结所指出的，会议引发了大家对哲学史的兴趣。这就使得中外哲学史这两个分支学科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培育了众多的专业人才。5月的工作会议部署的中国哲学史的资料编辑工作，洪谦等先生提出的编译供初学者用的西方哲学史资料选编等主张，后来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这些工作的成果（如北大西方哲学史教研室选编的六本资料），哺育了几代学子。本书汇集的回顾和反思的文章提供了一种视角。使我们感到，如果细细品味的话，其哲学意蕴还是相当丰富的。一则，与会者在讨论那些今天已经被淡化的哲学问题的时候，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哲学学科的研究。如梁志学和陈霞在《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一文中所指出，会上贺麟等人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依据来源于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就对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问题提出的经过独立思考的看法，克服了苏联哲学界流行的观点，“这是新中国哲学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对中国近现代哲学有专门研究的郁振华先生在其文章中指出，冯友兰、贺麟先生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些观点和论据，对于他们在40年代形成的哲学思想也有所推进。另则，座谈会提出了许多至今仍然有待研究的哲学问题。尽管胡绳最后的发言，有点总结的味道，但终究是一次没有结论的会议。档案透露，会议的主持者之一，时任北大哲学系主任的郑昕先生在会后评价会议说，看起来日丹诺夫定义的拥护派好像是“以声势取胜”了，

但是实际上谁也没有说服谁。风云突变之后，官方下结论，把质疑日丹诺夫定义的论者扣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说：“宣布一个哲学思想是错误的，并不等于制服它。”会上激辩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许多至今未得澄明。首先是哲学和政治、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是郑昕先生在《开放唯心主义》一文中开宗明义提出的问题，涉及的是学术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而会上对中国哲学史上的人物和学派如何做阶级分析的许多讨论，涉及的也是类似的问题。这一问题近30年来仍然十分纠结。其次是如何对待教条主义？如何克服教条主义？这是当时会议的一个基调，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也是座谈会的一大收获。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就急转直下，后来干脆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取消了。改革开放之后，真理标准的讨论对教条主义是一大冲击。但是，环顾今日，教条主义的积习还是挥之不去，有的时候还十分的强势，其原因何在？如何解决？本书刊载的晋荣东教授的文章从认识论上作了探索。第三，怎样看待唯心主义？这一问题是当时会议的焦点之一。美国哲学家霍金给陆定一的信中提出的问题“你们如何定义唯心主义？”，当时并无回应。近30年来对西方哲学史的深入的学术研究，已经把这一问题深化。诸如，如何理解西方的本体论，解读“being”这个哲学范畴，古代的西方哲学有没有泾渭分明的唯心唯物之争等等问题都一一提出，并加以辨析。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成果丰硕，对于历史上的唯心主义的评价和分析已经大有突破和进展。可惜，有些哲学原理的教科书还是在沿用1950年代对这些问题的论点，并当作标准答案灌输给青年学生。第四，如何对待中国自己的哲学传统和文化传统？座谈会上冯友兰先生的见解后来以“抽象继承法”为名留存于世。尽管长时期中一直受到批判，但是冯先生在晚年还一直坚持，学界赞同之声也时常出现。这到底是一个创见还是一种错误，学界似乎还没有充分讨论。郁振华先生的文章提出，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应当视为一种创见。座谈会上，周辅成先生对于道德继承问题也做过精细的分析，可惜，迄今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当今的社会生活又把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德继承问题，非常尖锐地摆在我们的面前。社会上歧见纷呈，好像兜了一个圈子还是回到了半个世纪之前。第五，与此相关的是哲学上的一个老问题，普遍和特殊的关系问题，不仅是认识论领域的问题，更是价值论领域的问题，至今还困扰着国人。冯友兰、周辅成等就价值论作出的阐释，还未引起充分的重视和评析。第六，座谈会关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关系问题的争辩，涉及辩证法的一个核心问题——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如梁志学先生所指出，会上对日丹诺夫定义作出质疑的学者，实质上依据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颠覆了“斗争的绝对性”这一被苏联学界奉为经典的命题。然而，这一命题正是带来许多悲剧的“斗争哲学”的理论依据。可惜，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尽管也有过讨论，但是“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一苏式教条，至今还写在我们的教科书上，继续向正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干部和学生灌输。凡此等等，足以说明，这是一桩未了的学术公案。所涉及的内容不仅涉及哲学的学理也涉及公众非常关心的诸多问题。令人遗憾的是，这次重要的会议，几近湮没。北大哲学系建系80周年之际，汪子嵩先生有过回忆文章。座谈会50周年之际北大哲学系曾经开过一个小型纪念会。近年来对冯友兰，贺麟、张岱年等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也很少涉及他们在此次会议前后的学术思想。有鉴于此，我们才决定编纂此书，期望引起学界重视对此次会议所涉的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

内容概要

1957年 中国哲学界 百家争鸣

金岳霖 冯友兰 贺麟 郑昕 朱谦之 朱光潜 何思敬

侯外庐 吕振羽 胡绳 潘梓年 于光远 艾思奇

任继愈 周辅成 汪子嵩 朱伯崑 陈修斋 张世英……

在学术与政治的夹缝中大胆发声

追问中国哲学往何处去 共同捍卫思想的尊严

1951年，电影《武训传》遭到批判，随后，“胡风反革命集团”、红学家俞平伯、胡适、梁漱溟相继成为批判对象。多次“运动”过后，文化界、知识界、思想界噤声一片，知识分子心中阴云弥漫，难以消散。

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鼓励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事业。知识分子迎来了早春天气。

1956年8月，自然科学界生物遗传学会议在青岛召开，新华社报道称之为“我国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开端”。

1957年1月，为了进一步在社会科学领域贯彻双百方针，“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会议主题聚焦在，是对苏式教条主义理论亦步亦趋，还是也应深入探讨中国哲学的传统与特色？如何看待唯物与唯心两条路线之间的关系？中国哲学遗产应如何继承？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贺麟强调的“唯心主义也有好东西”等观点引发了诸多争议。此次会议被广泛认为是“建国后近30年中仅有的一次基本上做到自由争鸣的讨论会”。会上，诸位学者“风云守道”，在这难得而有限的“自由争鸣”中，力现自己的文化担当，展示出自由之思考、独立之人格这一真正的学人风骨。

1957年6月，《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出炉，反右派运动展开，知识分子的短暂春天就此画上句点……

1957年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唯一一次名家荟萃，老中青学者参与，气氛活跃，畅所欲言又向全社会广泛传播的学术会议，在当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本书在编纂和重刊会议实录的同时，发掘出诸多不易见到的珍贵史料，收入了当时《人民日报》、《新建设》等重要报刊发表的相关报道，北大、哈佛大学收藏的独家档案，汇集了汪子嵩、方昕、梁志学等亲历者撰写的回忆文章，还邀集学人写了一些回顾与反思的文稿，不仅提供了许多独到的视角和新鲜的资料，而且展示了新一代学者对此次会议精神的感悟，共同追思当代中国学者的“守道”历程。

。

《守道1957》

作者简介

赵修义，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纲要》等。

张翼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哲学问题探索》（合著）等。

书籍目录

目录

前言

1957年中国哲学史会议实录

北京哲学界讨论中国哲学史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召开中国哲学史座谈会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工作总结（草稿）

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后的一些反映

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 冯友兰批判对这一政策的各种怀疑论调

哲学史家聚会北大临湖轩 座谈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第三天 在遗产继承等问题上尖锐交锋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闭幕 昨日讨论资料整理出版问题

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散记

中国哲学史问题讨论专辑

郑昕 开放唯心主义

冯友兰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

冯友兰 关于“两个问题”的补充意见

朱伯崑 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洪谦 谈谈学习西方哲学史的问题

任继愈 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

汪毅 一个问题，一点意见

石峻 论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讨论及其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张岱年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范围问题

朱谦之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

朱启贤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问题

韩树英 谈谈关于哲学史的对象问题

杨宪邦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科学性和党性

张岱年 关于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的几个问题

任继愈 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所遇到的几个困难问题

张恒寿 关于中国哲学史中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

朱光潜 谈思想两栖

魏明经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史

王太庆 哲学史研究的方法与目的问题

贺麟 对于哲学史研究中两个争论问题的意见

贺麟 关于对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

陈修斋 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

关锋 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

张世英 略谈对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

陈修斋 关于对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

张岱年 如何对待唯心主义

王方名 关于对待唯心主义问题

任华 谈谈哲学史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

邓初民 读了关锋先生“关于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问题”以后

冯友兰 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冯友兰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补充意见

周辅成 必须重视祖国哲学遗产的特点和价值
张岱年 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
朱启贤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杨正典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几点意见
黄子通 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继承问题的错误观点
张岱年 关于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定思 中国哲学史的继承性问题
吴恩裕 我对几个哲学问题的看法
汤一介 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关锋 关于继承哲学遗产的一个问题
燕鸣轩 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点意见
赵俪生 论哲学遗产的具体意义与抽象意义的区分
张恩慈 沈少周 怎样认识哲学中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的关系
杨洁民 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萧蓬父 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性
萧蓬父 关于继承祖国哲学遗产的目的和方法问题
艾思奇 对“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的一些意见

李志逵 读冯友兰先生“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的一点意见
孙长江 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社会历史理论是有没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
羊华荣 我赞成冯友兰先生的看法
戴清亮 林可济 对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观的评价的一些意见
唐钺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引起的三个问题
温公颐 对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些意见
胡绳 关于哲学史的研究
补遗
贺麟 集中力量反对教条主义
关锋 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

追忆与反思

汪子嵩 一次争鸣的讨论会——1994年6月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建系80周年作
方昕 短暂机遇期的一次全国性学术盛会——1957年北大中国哲学史座谈实况追记与反思
梁志学 我的回忆
周继旨 有关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回忆与反思
张翼星 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召开的缘由和启示
赵修义 不该湮没的一次“百家争鸣”的尝试
陈村富 中国哲学史座谈会55年祭
谢龙 百家争鸣与反对教条主义——“启蒙”征兆被摧毁的历史教训
张翼星 一场有待展开的哲学争鸣——我对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几点认识
梁志学 陈霞 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对“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反思
陈霞 谈谈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对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再反思
陈卫平 “抽象继承法”蕴涵的问题：传统哲学何以具有当代价值
郁振华 1957年中哲史座谈会上的冯友兰和贺麟
晋荣东 教条主义及其认识论根源——冯契与1957年中哲史会议
顾洪亮 “你们如何界定唯心主义？”——记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几则通信
附：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来往信件
后记

《守道1957》

章节摘录

短暂机遇期的一次全国性学术盛会——1957年北大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况追记与反思 方昕这些年，每到新春一月，我的一些当年的北大同学、同事和师长，见面时常不忘提及数十年前亲历的那次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我于1955年从中央组织部经全国统考进北大哲学系学习，1956年暑期之后经校方任命担任系秘书。在郑昕、汪子嵩先生领导下，亲历了那次会议从酝酿筹备到会务全过程。1957年1月，由北大哲学系发起的那次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学术讨论会，在刚刚经历过万马齐喑的年头，与会的老中青三代学人（应邀出席者120余人，前来旁听的北大及兄弟院校本科生、研究生近百人，另《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哲学研究》、《新建设》等媒体先后前来采访者10余人）多数人能够把自己想讲的观点基本上都讲出来，在当时确属难得。开在难得的短暂机遇期大家见面时，聊得最多的是，那个会从筹备到顺利举行，恰好处于一个短暂的机遇期：开早了，开不了；开晚了，开不成。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恰好被抓住了。1956年前，全国性的批判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批电影《武训传》；批以俞平伯先生为代表的《红楼梦》研究学者；批胡适，从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到批判其“反动政治思想”，乃至批判其洋老师杜威等人；批梁漱溟；批胡风，从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开始，到批判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小集团，接着又牵引出一场震动全国、规模空前的“肃反”运动（大批中老年知识分子以及与他们往来较多的党政干部，乃至某些资深的高级干部如潘汉年、彭柏山等都成了“肃反”对象，导致数以万计者被监禁、劳改终身）。此外，致使高等学校沦为重灾区，消极影响重大、深远的还有历时数年的“院系调整”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高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当年根据政治需要按照苏联模式对全国高等学校动大手术，进行撤并改造重组，包括著名的燕京大学、东吴大学、朝阳大学在内的诸多高校被撤销。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被砍掉，众多的哲学系被撤掉，原有教师学生被调入北大，北大哲学系一度成为全国“只此一家”（直至1956年下半年起始陆续在几所高校恢复哲学系）。历时数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则是把从民国时期过来的高校老教师列为改造对象，毛泽东提出要求他们“脱裤子”、“割尾巴”，力求通过一次次自我批判和互相批判，肃清“资产阶级影响”。在此期间，各高校中许多资深的乃至国内外知名度颇高的老教师还被剥夺了上讲坛授课的权利。连续几年下来，一片肃杀之气充斥中国大学校园。物极必反。经过数年煎熬，终于迎来了春天（尽管这个春天过于短暂）。回顾历史，从1956年初至1957年夏初，可称为两个整肃期（毋庸讳言，后者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前者）之间的宽松期。至今，亲历者仍不忘津津乐道那个短暂而多彩的一个个令人目不暇接的横断面：1956年1月14日，由中共中央召开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党政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共1200多人参加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中南海隆重开幕。这一出乎意外的大型专题会议，在会前经过长时间的郑重筹备。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党政领导机关中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宗派主义倾向，低估了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妨碍了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周恩来在报告中郑重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大会还向全国郑重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1月20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中提出全党上下要把“关于知识分子一系列问题”加以全面解决，迎接全国文化建设的高潮。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方针”。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提出实施双百方针。他宣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人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发表各种意见”。5月26日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奉命在中南海怀仁堂向知识界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演讲，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有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自由。陆定一的演讲对双百方针作了详尽透彻的阐述，在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当时党内一些“左”派人士由于对双百方针不理解而发出的不谐言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2月27日、3月12日，针对知识界一些人的重重疑虑，毛泽东先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和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一再强调“双百方针是一个基本性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此外，毛泽东在这一年多的时间，还曾先后分别约请多位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知名人士在他的书房里谈心，听取他们关于发展学术事业的意见和建议，颇得好评。正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机遇期，为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在之前是想都不敢想的。抓

住机遇，主动发起1956年的早春气候，在学术界许多知识分子的心里燃起了希望。尽管对于屡历沧桑、富有政治经验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来说仍将信将疑，但是大家普遍希望抓住当时有利时机，做些能够做、可以做的事，在推动学术发展、培养造就人才方面有所作为。北大哲学系部分老中年教师经过酝酿，打算从破除“日丹诺夫戒律”上打开缺口，在哲学领域突破坚冰，引导各种不同观点展开争鸣，举办一次学术讨论会的雏议开始形成。由中哲史、外哲史教研室引领，波及其他各教研室。以往，由于死守苏式教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人日丹诺夫的一席讲话，竟长期束缚苏联、中国及东欧各国哲学界，大家不得越雷池一步，把丰富多彩的哲学发展史变成干巴巴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互相斗争，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对持有异议者动辄上升到政治问题加以讨伐、制裁。对此，大家早已忍无可忍。抨击乃至去除这一戒律，解放哲学界，乃学者们的共同心愿。用几千年丰富多彩的中国哲学发展的文明史，驳斥日氏戒律，去除此一枷锁，成为举办此次酝酿中的哲学讨论会的共识。而且众人一致主张“要开就开大的”，即开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邀请全国哲学界有志者共同参与，共议复兴哲学学术和哲学教育事业大计。为了避免审批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麻烦（开这样的会，可以说

是1949年建国后中国哲学界第一次吃螃蟹，大家都小心翼翼），于是议定把会议的名称低调定为“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级领导的首肯和相关部门热情支持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热情支持。首先是造舆论。经与《人民日报》理论部负责人商妥，陆续在该报理论版发表数篇重头文章：郑昕先生的《开放唯心主义》，冯友兰先生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朱伯崑先生的《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文章刊登后，在学术界获得一致好评，有些读者致信报社编辑部，希望多多刊载类似有利于促进开展学术讨论的好文章。接着，与有关领导机关接洽，试探获准召开的可能性。第一步，请示校党委。党委书记江隆基同志对哲学系带头发起组织全国性学术会议大加称赞，并表示对上对外交涉如遇困难，学校党委可出面。同时指示学校各有关职能部门切实做好各方面的保障工作，确保会议圆满举行。对上对外交涉，没想到竟一路顺风。这当然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时任中宣部科学处（当时党中央各部门无局级设置，处即相当于现今各部门的司局）处长的于光远同志表示，开好这次会议，将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他还主动帮助与中宣部理论处、教育处等职能部门接洽，均获得支持。高教部政教司负责人也表示热情支持，还提出如有必要，可由他们向上级主管部门接洽以及向有关兄弟学校打招呼。这里还特别想提及当时在北大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任教员的严慰冰同志（陆定一部长夫人）。她是由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前身）某培训班毕业后分配来北大任教的，她和同事间相处很亲切，大家都称呼她严大姐或慰冰大姐。当我们提出请她就我们召开哲学学术研讨会一事在部长那里吹吹风，她当即满口答应，并很快有了回音。她说：对他来说这样求之不得的好事，哪能不支持呀！（至于后来文革中她遭受林彪、叶群之流丧失人性的恶毒摧残，北大同仁无不愤慨之极）在同中央级相关各学术机构接洽中，都普遍获得这些单位领导同志的全力支持与赞许。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科院前身）副主任潘梓年同志（主任郭沫若先生为挂名，潘为实际主持人，并曾兼任哲学所所长）最为热情。当时我们曾数度提出由“学部”主办此次学术会议，均被其婉拒，他示意由你们北大出面最合适，学部及哲学所将全力支持，届时两机构主要学者和他本人都将莅会，并将通知准备与会人员会在会前写作论文或发言稿。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胡绳同志对这次学术活动也表示高度关注和支持。除表示届时派出强大阵容参会外，还欣然允诺承担会议总结发言的重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顾锦屏等多位资深专家，也都表示将以老朋友身份与会，参加切磋研讨。中共中央党校以艾思奇同志为首的数位资深哲学家都表示将集体与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人民大学……诸多兄弟院校的同行都表示在当时召开一次全国性哲学学术研讨会，贯彻双百方针，破除教条主义等绳索，是适时的、必要的。在忆及这次全国性哲学研讨会从酝酿、筹备到会议成功运行的全过程中，应当特别提及核心人物汪子嵩先生。子嵩先生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千里迢迢历经艰险从祖籍浙江奔赴地处西南边陲、举国闻名的西南联大。在联大，他一面师从希腊哲学研究专家陈康先生刻苦攻读希腊哲学，颇受陈先生赏识；一面热心参加救亡运动。在参加中共地下党之后，成了当地学界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群众运动的活跃分子。抗战胜利后北大返京，在经过院系调整之后的北大哲学系，子嵩先生受命主持系务日常工作，担任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同时担任北大校党委委员）。此时，他毅然放下热衷的希腊哲学研究，全身心投入率领全系师生为办好当时全国唯一幸存的哲学系竭尽全力。他一方面做好来自七、八所兄弟院校教师的思想稳定和关系协调工作，与他们做知心朋友；一面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尽可能保护被触及的教师，减轻政治压力。同时对被剥夺授课权利的教师，尽可能采取补救措施，如安排他们开设若干专题讲座和某些专门化课程，组织编辑或编译

中外哲学思想史料，参与中央编译局委托的某些经典文献的翻译和咨询服务。在他的多方努力下，还有几位知名的北大哲学系学者应聘担任《人民日报》学术顾问等等，使他们不致被边缘化而荒废业务，为日后中国哲学教育的恢复发展储备至关重要的师资资源。因此，在酝酿组织此次学术讨论会过程中，他自然成为组织大家多方谋划的关键人物。此外，他在校外学术界及诸多中央党政机关具有广泛与良好的人际关系，平时即经常邀请诸多一流学者来校演讲或授课，每请必到。这就为促成此次学术研讨会的梦想成真提供了必备的外部条件。自由争辩精神贯穿会议全过程在经过较为充分的酝酿和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的基础上，座谈会于1957年1月22日如期在北大举行。由郑昕、潘梓年、何思敬的轮流主持。来自四面八方的哲学界旧友新朋，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大家共同怀抱通过敞开心扉，自由争辩，取得共识，力求在排除对哲学学术研究和哲学教育事业严重干扰的教条主义和诸多不恰当的政治干预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把“双百方针”从口头上、字面上落到实处，以繁荣哲学学术和哲学教育事业，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迫切需要。与会的老中青三代学人，大多数人都能借参与这一开国以来首次大型学术研讨会的机会，把自己积攒心中多时想说的话说出来，一次说不完，再三再四陈述。对不同的意见，据理力争，却很少出现扣帽子，强加于人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泰斗式人物冯友兰、贺麟、朱光潜、金岳霖等人的发言，都具有一定的深度，对引起争辩的问题，一再申明自己的观点，在整个几天研讨中，起了引领的作用。在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张岱年、任继愈、洪谦、陈修斋、朱伯崑、张恒寿等的高质量发言，吸引与会者的关注，形成一次次精彩的场面。个别“左”派人物（如关锋、孙定国）在当时的氛围下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实在按捺不住时甩出几句如“修正主义”之类扣政治帽子的言辞，但颇不得人心。也有少数与会者曾因此而迟疑却步，这不过是支流而已。会议谈论的最多话题之一，是如何对待唯心主义哲学。与会大多数人认为过去几年对待唯心主义的批判乃至声讨，固然受国际的影响，与“以苏为师”，照抄照搬洋教条有关，但是政治的介入，动用党政权力，干预本属学术领域的争论，甚至涉及对人的使用、升迁，极端的情形发展到从舆论的讨伐问罪到使用司法等极端手段，剥夺学者的人身自由。这些粗暴行径不仅大大超出学术争议范围，且构成严重违法违宪行为。在党中央大力提倡实行“双百方针”的今天，有必要彻底扭转以往的错误行径，纠正既往一切错误举措，追究违纪违法者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使“双百方针”从众人将信将疑转化为深信不疑，做到取信于民。就学术而论，众多学者认为，历史上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哲学是共生的现象，两者之间有争论，有时还很激烈，但不存在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问题，而且往往还有吸收对方长处充实自己的情形。平时，我们课堂上不是常讲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吗？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创立唯物辩证的新型哲学，不是曾经拜先辈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等许多人为师，从他们的哲学思想中吸取有益成份加以利用、改造的吗？为什么发展到今天，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自居的学者竟数典忘祖了呢？！中心议题是反对哲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许多人在发言中一致认为当时影响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倾向是教条主义。除了国际版的日丹诺夫戒律外，国内版的教条主义者除利用国际版的余威兴风作浪，他们还往往利用政治上掌握一定权力的优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自居，颐指气使，对经历民国时期特别是留学欧美归来的老一代哲学家，一概否定，在历次运动中把他们作为靶子。因此，此类教条主义者他们身上兼具专制主义气息。所以当年人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也不能不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专制主义，此次会议也不例外。会上也有一些老知识分子心存余悸，惟恐有朝一日遭到反攻倒算。在上述复杂心态支配下，此次座谈会上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只能说是小试锋芒，不甘缄默又适可而止是当时多数人的战术。但总体来说，这是一次以知识界为主体，初试锋芒，反击曾经盛行一时的教条主义、专制主义的一次盛会。它同1956年在青岛举行的自然科学界关于遗传学的全国性大型座谈会，共同构成那个年代留给人们的两道相互辉映的靓丽风景。人们对于当年的勇敢者们一直是怀有深深敬仰之情的。几点遐想几十年岁月过去了，当年北大中哲史座谈会的与会者以及当时关注此次学术会议的人们，就如何评价此次学术会议以及与此会有关的一些问题，如为什么会那段短暂的宽松期，双百方针的提出及实施期为何如此短暂，乃至对这一方针本身置评等等，可谓众说纷纭。关于此次学术座谈会的评价，上一节已作简略述评，不赘。关于1956年初至1957年夏初那一段短暂的宽松期，应当说是国内、国际诸多因素促成的。诸如之前数年运动连绵不绝，特别是院系调整及相伴随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随后的“肃反”运动，对知识分子阶层伤害深重，为社会稳定起见亟需休养生息。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也须营造宽松气氛。苏共20大的召开，赫鲁晓夫做反斯大林秘密报告，苏国内局势不稳，东欧波匈事件频发和扩散等等，都可能对国内政局造成不利影响。故有必要从安定知识阶层入手，营造国内宽松环境，以防患于未然。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公开号召全国公众大鸣大放帮助执政党整风。一时间各种

批评建议喷薄而出，尽管绝大部分都出于善意，但因有些话题涉及敏感政治问题，致使当局惟恐失控，于是，风向陡变。6月中旬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席卷全国，短暂的宽松期结束，高等学校成了反右派运动的重灾区。中哲史座谈会的有些参与者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有些人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违心的检讨，以求侥幸过关。有些人在“文革”中再次受到更加严厉的清算，使他们遭遇灭顶之灾。对于当年怀疑双百方针是圈套者，似可说是一语中籤。关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当年提出双百方针的根由，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我的同窗赵修义近期在《不该被湮没的一次“百家争鸣”的尝试》的长文中，把对于苏共长期在思想文化乃至国民经济领域中推行教条主义的严重弊端引以为戒之说，应是可信的。至于涉及提出者主观上是否有蓄意应用“钓鱼术”之说（有人曾将当时一再提出双百方针是随后反右运动中应用“引蛇出洞”的“钓鱼术”的一次预演），因求证之难，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以为存疑似更为稳妥。关于双百方针本身，与当年提出者的主观意向，应视为两回事。提出并实施双百方针，无论中外，均有悠久历史，其正面效应，有众多史实为鉴。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解放学说出发，实现所有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乃未来社会的终极目标。因此，双百方针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的方针是肯定无疑的。应作为全世界共产党人人为之共同奋斗的一个目标。当然，在现实世界中切切实实地贯彻实施这一方针，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的和文化的条件，尚需要我们大家为创造这些条件做出不懈地努力。至此，笔者还拟稍加引申，就有关的两点遐想作简略申述。一是如果破除意识形态的制约，唯心主义哲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就很容易呈现在我们面前。近几个世纪，一个个大国轮番崛起，交替称雄于世。这些国家的强盛，固然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分不开的，人们稍加推究，即不难发现，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哲学也功不可没。比如，唯心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大行其道，推动国民教育的发达，科学技术进步在全球后来居上，对于美利坚合众国于二十世纪迅速取代大英帝国称霸全球，深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并未致美国于一蹶不振。而百余年来，美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却难有作为。由此可见，主张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相互学习，各取对方之所长，对于推动各派哲学的发展，各自社会功能的发挥，是有益无害的。二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其主要领导人正是之后的中共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德先生和赛先生一时誉满全国。追求民主与科学者不限于学界，其在新兴工人阶级、商界乃至若干政界人物中均有重大影响。之后，在当时的联共（布）操纵的共产国际主导中共早年的活动开始，苏联模式对早期的中共起支配作用。于是，“五四”时期以民主与科学为标志的启蒙运动中止。自此，搬用苏联模式长达数十年之久。即使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之后，“苏式”后遗症仍纠缠中国不止。甚消极影响，概而言之，即疏远德先生、赛先生，遗害巨大。经济建设方面，虽成就显赫，但失误过多，代价高昂，成效难如民意。虽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但人均GDP仅及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的10%不到。而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的严重滞后，更为国家的未来发展积累众多待解的重大问题。百余年前，马克思即曾一再昭示世人：哲学不仅用于说明世界，更是用来改造世界。哲学，向来就不纯是“书生空议论”，笔墨官司。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之路怎么走？当前诸多重大难题如何破解？中国国运如何进一步振兴，乃至引导世界尽快走出当前由美欧引发的又一次全球性超级危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大有用武之地。只要能够牢记经验教训，不再重复教条主义，面向实际，正视现实，深信不会令世人失望。

后记

2010年8月我们北京大学哲学系1955级同学会聚北京，参加汪子嵩先生主持的《希腊哲学史》第四卷发布仪式，并庆祝毕业50周年。在聚会期间，师兄方昕提出，1957年初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是中国老一代学者敢于讲真话，向苏式教条主义发难的一个会议，非常重要。建议五五级同学一起来做件于全国学术界有益的事——重新回顾和反思当年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并汇集有关资料为学术界保存一份可贵的遗产。方昕当年担当了从会议的筹备开始到整理会议档案全过程的具体事务。可以说是这次会议的全程亲历者。他对会议之重要的感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这个倡议获在场同学一致赞成。在8月20日《希腊哲学史》发布会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在场的非五五级的同学如李真、王树人、李玉章、武维琴和社科院哲学所几位学者如姚介厚等也深表赞同。我们深感，作为1950—60年代的亲历者，对这个已经逝去的年代的思想家是“精神相通，血脉相连”的。活跃于会上的前辈学者有些就是我们的老师，非常亲切，也非常亲密。这份感情，使得我们对这些前辈学人有一种同情的了解。诚如冯契先生所说，同情的了解尽管也会失之偏颇，但是“哲学的意蕴（意义和意味）正是因为有同情的了解才能充分揭示出来”。所以，我们确实有一份责任，在有生之年把这件事情做好。为落实这一动议，陈村富于2011年5月16—19日在杭州召集张翼星、赵修义、朱贻庭一起碰面，商议分头进一步收集资料，撰写评论，并邀请了学长和一些有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著文评说。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各方的热情支持。梁志学先生作为会议的亲历者特地为本书撰写了新的回忆文章，年过八旬的周继旨等先生特地撰写了长文。华东师大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郁振华、晋荣东教授撰写了富有学理深度的专文，顾红亮教授在美国访学期间还从哈佛大学的档案中找到了会议前后美国哲学家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通信原件和手稿等珍贵史料。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哲学”的上海师范大学陈卫平教授大力支持我们的工作，不仅亲自撰写专文还主办以“纪念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为主题的学术会议，邀集各地的专家就此进行研讨，给了我们听取各方见解的机会。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采访部主任山顺明先生为本书资料的寻访提供了热情的帮助。没有他们的相助，我们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是难以完成这项工作的。今年正值北京大学哲学系建系100周年，谨此作为我们五五级系友的一份献礼。以期引起大家对于哲学系百年历史之跌宕起伏，以及它在中国学术史上所起的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的全面反思。。本书得以付梓全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陈昕先生的鼎力支持，世纪文景公司的姚映然副总编和执行编辑马晓玲女士为本书的改进和顺利出版付出了许多心血，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赵修义 张翼星 陈村富 朱贻庭

编辑推荐

《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编辑推荐：1957年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是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唯一一次名家荟萃，老中青学者参与，气氛活跃，畅所欲言又向全社会广泛传播的学术会议，在当代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在编纂和重刊会议实录的同时，发掘出诸多不易见到的珍贵史料，收入了当时《人民日报》、《新建设》等重要报刊发表的相关报道，北大、哈佛大学收藏的独家档案，汇集了汪子嵩、方昕、梁志学等亲历者撰写的回忆文章，还邀集学人写了一些回顾与反思的文稿，不仅提供了许多独到的视角和新鲜的资料，而且展示了新一代学者对此次会议精神的感悟，共同追思当代中国学者的“守道”历程。

精彩短评

- 1、翻过, 没什么意思
- 2、#淘书偶记#直接编录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文汇，真实可信。
- 3、留档查看
- 4、学人风骨
- 5、不管怎样，这可是珍贵的历史资料。。。。
- 6、直接编录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文汇，真实可信。

1、书名守道，要是理解成in defence of Dao恐怕高估了这场会，还是理解成题目说的那样比较合适。封底的时间表还应该加上一个日期，就是1947年，苏共主抓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提出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前者战胜后者历史。这书1948年就有中译本，建国后成为科条。会议的日期是1957年1月22-26日，最重要的发言是贺麟和冯友兰，前者的意思是说唯物、唯心两者时时接触，多面斗争，许多唯物主义者也吸收唯心主义的思想资源，是师生关系。冯提了一个抽象继承法，说哲学有抽象意义，基本就是超阶级的，把这些继承下来。此外郑昕的那篇话说得比较刺眼，说外国唯心主义都不是白给的，真正给帝国主义直接当狗腿子的也不多。还说思想的转变不必军队换防，要想心服口服还得长期讨论。通览会议的发言，基本的调子是在抱怨使用唯物史观治哲学史的一些具体困难，再看看后面的回顾，从选题、承办单位，到发言人员，也是精心设计的，关锋等人就是负责压人的，总结里说他一扣帽子别人又不敢说话了，还有的材料回忆说他们还是难以服人。但总之不久发起批判的正是此人。1957年5月又开了一次会，毛的《事情正在起变化》是5月15日写，据研究是6月11号发表的（在《毛选》第五卷）。但总之6月8日已经决定反右，5月底风声已经很紧。那是冯和贺都不说话了，冯只是捋胡子。书里说不能用老奸巨滑来理解。好吧，有智慧。跟陈寅恪答复中科院，要求毛刘写信承诺不学习，不信马列的霸气相比，这场会议不过是在承认游戏规则的前提下为自己争取点空间而已。回顾的部分，北大档案馆的《总结》和前几篇回忆文章比较有分量，提出的观点不过是政治不要干预学术之类。个人比较关心这次会议以后，决定出版的哲学史资料下文如何？好像书里提过西哲方面，中哲没有说。提倡唯物主义，一定关注异端作家，其实很考验文献。跟五四是一样，提倡俗文学和小说，也都是文献学的大家去做。日后提倡服务工农兵，注本又精审又简练。这部分还有价值。上周读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亮点不少，讲郭象人性论的反动本质，和门阀政治挂起来，翻看杨立华的《郭象庄子注研究》，“性分与自然”节，引用的材料基本不出侯的证据，但多了两条，说明郭象也讲“习”，本该形成非常有趣的对话的。我们现在基本选择彻底遗忘，打翻重来，未免有点可惜。马哲那套有僵化之处，也有洞见。功力深厚的人做过，开拓不少。记得书里有个极端的例子，找不着页码了。说张载是唯物主义者，所以是进步的，不是代表无产阶级至少也代表下层地主阶级。然后考证了张载家的地产，结果还是比较多。继而有人提出，宋制一亩比今制少，所以还是下层地主。不禁佩服那时候人真有学问。

2、【编者按】10月27日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哲学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创建100周年的日子。在百年历史的跌宕起伏中，20世纪50年代的初期，北大哲学系地位显要，院系调整汇聚了哲学界的诸位大家，在1956年之前成了全国仅有的哲学系。在“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之后，1957年1月在中宣部、高教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现在的中国社科院前身）、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等权威部门的支持下，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发起举办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难得的一次全国性的自由争鸣的学术会议，影响深远。集中反映此次会议的《守道1957——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一书，新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付印。那桩学术公案的启迪（赵修义等）

1957年1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发起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已经过去了55年。对那次座谈会的回顾和反思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细细品味，其哲学意蕴还是相当丰富的。首先是哲学和政治、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是郑昕先生在《开放唯心主义》一文中开宗明义提出的问题，涉及的是学术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而会上对中国哲学史上的人物和学派如何做阶级分析的许多讨论，涉及的也是类似的问题。这一问题近30年来仍然十分纠结。其次是如何对待教条主义。如何克服教条主义。这是当时会议的一个基调，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也是座谈会的一大收获。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就急转直下，后来干脆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取消了。改革开放之后，真理标准的讨论对教条主义是一大冲击。但是，环顾今日，教条主义的积习还是挥之不去，有的时候还十分的强势，其原因何在？如何解决？

第三，怎样看待唯心主义。这一问题也是当时会议的焦点之一。近30年来对西方哲学史的深入的学术研究，已经把这一问题深化。可惜，有些哲学原理的教科书还是在沿用1950年代对这些问题的论点，并当作标准答案灌输给青年学生。第四，如何对待中国自己的哲学传统和文化传统。座谈会上冯友兰先生的见解后来以“抽象继承法”为名留存于世。这到底是一个创见还是一种错误，学界似乎还没有充分讨论。而当今的社会生活又把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德继承问题，非常尖锐地摆在我们的面前。社会上歧见纷呈，好像兜了一个圈子还是回到了半个世纪之前。第五，与此相关的是哲学上的一个老问题，普遍和特殊的关系问题。不仅是认识论领域的问题，更是价值论领域的问题，至今还困扰

着国人。冯友兰、周辅成等就价值论作出的阐释，还未引起充分的重视和评析。第六，座谈会关于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关系问题的争辩，涉及辩证法的一个核心问题——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然而，这一命题正是带来许多悲剧的“斗争哲学”的理论依据。可惜，这样一些重大的问题，尽管也有过讨论，但是“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一苏式教条，至今还写在我们的教科书上，继续向正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干部和学生灌输。（作者系华东师大教授）

重温历史厘清界限（陈村富）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定时候、一定条件下形成“百家争鸣”式的学术大讨论古今中外已有多次。这是必然的。能否“因势利导”，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效应。其经验教训值得引以为鉴。

第一，对国内形势的估计。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根本制度方面毕竟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在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政治格局情势下，敌对势力总是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力图改变中国的走向。发生在我国学术争论，或者是关涉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大讨论，必然存在五花八门的各种见解，其中免不了存在类似1957年五六月的“出轨”的言论。显然，只要不违反法律，不搞非法活动，只要是思想上、观点上的问题，恰恰是应通过形势所允许的对话和争论来解决。1957年反右斗争的一步一步地严重地扩大打击面。关键就是对形势和知识分子的估计。

第二，严格区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与学术观点问题。1957年的反右斗争，毛泽东定性为“政治思想上的革命”。往后大多将“政治思想”并提，而且后来又在报刊上出现批判“纯学术”，还认为不能离开政治谈思想认识，对思想问题要“上纲上线”。这样必然导致思想认识问题、学术问题政治化，混同二者的界线。这个界线如何把握，是一个应该研究的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也曾不同程度发生过。思想和学术不像“物化”的文化成品，犹如“文物”界线分明，易于鉴定。它也不像制度层面的文化产物，犹如宪法条文，可以从条文上判断，维护谁的利益。思想和学术以个人的看法、见解的形态存在。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称之为doxa，即个人的，可变的意见、见解、看法。用近代哲学的话说是非物化，存在于脑子中的个人的体验、想法。它存在于脑海中。它可能成为指导社会群体行为的意识形态，但不等于就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意见、学术观点，在一定条件下往往有某种相似或共同点，而且易受环境影响，或在争论上接受某种看法，甚至成为一种思潮，因此需要特别谨慎，不能让极个别的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思想混乱。但是一定要吸取历史教训，重温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区分开来”，还要把政治与思想的问题区分开，切忌将思想认识上纲上线，说成是“同什么人、什么主义相呼应的思想”、“起到什么无法起的作用”，更不可随意上升为什么政治问题，打击一大片，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

第三，“百家”与“两家”的问题。1957年夏开始的不断膨胀的批判，有一个理论就是认为所谓“百家”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两家。说这话的人，当然自认为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或者他所支持的观点，所组织的文章是马克思主义。从档案中“总结”中可以看出，1956年冯友兰、贺麟发表文章后，从中宣部理论局到哲学系的总支和党支部就有人认为质疑日丹诺夫定义的冯、贺二人是违背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代表，当时就有意识地组织文章批驳，并寄希望于艾思奇、胡绳、孙定国、关锋等代表马克思主义的发言。而会后反应，可以看出，尽管人们感到他们的或是发言一般化、或简单化，即使被定为总结性的报告也没能驳倒“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唯身居要津的关锋滔滔不绝，可是未能令人信服。尽管如此，这些发言仍然被认作是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者系浙江大学教授）

哲学，更是用来改造世界（方昕）

这次座谈会正是1956年初至1957年夏初那一段短暂的宽松期的一个缩影。应当说这是国内、国际诸多因素促成的。诸如之前数年运动连绵不绝，特别是院系调整及相伴随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随后的“肃反”运动，对知识分子阶层伤害深重，为社会稳定起见亟需休养生息。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也须营造宽松气氛。苏共20大的召开，赫鲁晓夫作反斯大林秘密报告，苏国内局势不稳，东欧波匈事件频发和扩散，等等，都可能对国内政局造成不利影响。故有必要从安定知识阶层入手，营造国内宽松环境，以防患于未然。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公开号召全国公众大鸣大放帮助执政党整风。一时间各种批评建议喷薄而出，尽管绝大部分都出于善意，但因有些话题涉及敏感政治问题，致使当局惟恐失控，于是，风向陡变。6月中旬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席卷全国，短暂的宽松期结束，高等学校成了反右派运动的重灾区。中哲史座谈会的有些参与者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有些人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作出违心的检讨，以求侥幸过关。有些人在“文革”中再次受到更加严厉的清算，使他们遭遇灭顶之灾。对于当年怀疑双百方针是圈套者，似可说是一语中籤。

关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当年提出双百方针的根由，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我的同窗赵修义近期在《不该被湮没的一次“百家争鸣”的尝试》的长文中，把对于苏共长期在思想文化乃至国民经济领域中推行教条主义的

严重弊端引以为戒之说，应是可信的。关于双百方针本身，与当年提出者的主观意向，应视为两回事。

百家争鸣，无论中外，均有悠久历史，其正面效应，有众多史实为鉴。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解放学说出发，实现所有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乃未来社会的终极目标。因此，双百方针作为符合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的方针是肯定无疑的。应作为全世界共产党人人为之共同奋斗的一个目标。当然，在现实世界中切切实实地贯彻实施这一方针，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的和文化的条件，尚需要我们大家为创造这些条件作出不懈的努力。

至此，笔者就有关的两点感想略作引申。一是如果破除意识形态的制约，唯心主义哲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就很容易呈现在我们面前。近几个世纪，一个个大国轮番崛起，交替称雄于世。这些国家的强盛，固然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是分不开的，人们稍加推究，即不难发现，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哲学也功不可没。比如，唯心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大行其道，推动国民教育的发达，科学技术进步在全球后来居上，对于美利坚合众国于20世纪迅速取代大英帝国称霸全球之后，深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并未使美国一蹶不振。而百余年来，美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却难有作为。由此可见，主张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相互学习，各取对方之所长，对于推动各派哲学的发展，各自社会功能的发挥，是有益无害的。

二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其主要领导人正是之后的中共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与李达等人。德先生和赛先生一时誉满全国。追求民主与科学者不限于学界，其在新兴工人阶级、商界乃至若干政界人物中均有重大影响。之后，在当时的联共（布）操纵的共产国际主导中共早年的活动开始，苏联模式对早期的中共起支配作用。于是，“五四”时期以民主与科学为标志的启蒙运动中止。自此，搬用苏联模式长达数十年之久。即使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之后，“苏式”后遗症仍纠缠中国不止。甚消极影响，概而言之，即疏远德先生、赛先生，遗害巨大。以经济建设为例，虽成就显赫，但失误过多，代价高昂，成效难如民意。虽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但人均GDP仅及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的10%不到。而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的严重滞后，更为国家的未来发展积累众多待解的重大问题。

百余年前，马克思即曾一再昭示世人：哲学不仅用于说明世界，更是用来改造世界。笔者以为，这是我们未来发展应该谨记的。（作者系离休学者，曾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兼社长，复建后的法律出版社负责人）

“抽象继承法”的当代价值（陈卫平）55年过去了，日丹诺夫定义早已成了明日黄花，但是，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除了质疑日丹诺夫定义的历史意义之外，它所蕴涵的传统哲学何以具有当代价值的问题，依然是需要认真回答的。“抽象继承法”意在唤起人们注重传统哲学的当代价值。这里蕴涵着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传统哲学对于当代中国何以是有价值的？

“抽象继承法”之所以有这样的蕴涵，是试图回答由日丹诺夫定义所带来的如下问题：“历史上的唯心主义，都是些坏东西，只有批判，很难吸收。而在历史上的唯物主义，跟马克思主义哲学比较起来，又非常贫乏。好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了，何必再向旧纸堆中寻找呢？”朱启贤在讨论中进一步揭示了这个问题：如果“历史上一切唯心主义都是要不得的东西；历史上一切唯物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比较起来都是贫乏的、低级的”；“如果说辩证唯物主义以外的其他哲学还有存在的意义，那，它们的存在也就只是作为‘古董’而存在。它们既然是要不得的坏东西和残缺不全的破东西，那么，它们对于我们就是业已失去了现实的意义。我们接触它们就只是像走进历史博物馆去看古董那样”。因此，提出“抽象继承法”实际上是为了回答“哲学何故要继承”，即中国今天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何以历史上过去的哲学思想在今天还能有用处？”贺麟引用马克思的话将“抽象继承法”所蕴涵的这一问题予以展开。他说：“关于哲学遗产的承继问题，主要在于说明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古典哲学思想，何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可以起良好的作用，可以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设。”并说：“马克思也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当他谈到希腊文艺的社会背景时他说：‘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贺麟也认为“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在他看来这是由“抽象继承法”所蕴涵的需要回答但却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对于“抽象继承法”，关锋指责其“否认哲学命题的‘一般意义’具有阶级性”，同时认为贺麟以马克思的话来提出何以需要注重传统哲学当代价值的问题，容易产生“严重混乱”，他把贺麟等揭示的“抽象继承法”蕴涵的传统哲学何以具有当代价值的问题取消了，以此维护日丹诺夫定义。在以后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到贺麟把马克思的上述论述看作回答这一颇为困难的问题的钥匙是正确的。（作者系上海师大教授）

3、1956年下半年，北大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许多教师多次讨论了教学和研究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惑，冯友兰、朱伯崑等还著文在报刊上发表。据当时筹办会务的方昕先生的回忆，正是在教师们群策群

力的推动下，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北大哲学系领导决定向中宣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主管部门申请发起一次全国性大型座谈会，得到了潘梓年、胡绳、于光远、李正文等负责干部的热情的支持。徐梵澄先生在谈到此次会议的主角之一贺麟先生时曾经说过，“贺麟是风云守道，有风云之气，但仍守道；我是守道而已”。也许“守道”就是这次座谈会的精神的集中体现。

贺麟谈唯物和唯心引发争论 第一次座谈会是在1957年1月22日开始的，经过四天的讨论，于26日结束。会前，北大哲学系主任郑昕先生发表了《开放唯心主义》一文，坦诚地说出了老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思想改造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内心的困惑和对于学术自由的殷切期望。贺麟在发言中首先说到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关系问题。他指出，过去几年来在哲学史研究中，由于教条主义的束缚，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犯了片面性的错误，只看到二者的斗争方面，没有看到二者的统一方面，因而把哲学史的发展，弄得很死板、贫乏。他认为：“哲学史虽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但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不是两个固定的阵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和宗教斗争政治斗争却有很大的区别”，“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师生朋友关系”。

关锋、朱谦之、孙定国等在发言中指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不仅有斗争的一面，还有统一的一面，片面地强调斗争，而忽视统一的一面是不对的。对于历史上唯心主义哲学的估价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采取简单化和一笔抹煞的态度是错误的。陈修斋在发言中表示基本上同意贺麟的意见。他认为：不应该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和正确与错误等同起来。唯心主义在历史上的出现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它不仅具有消极意义，而且也有积极意义。因此，唯心主义作为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阶段、必要的环节是有贡献的。黄子通、王方名、张世英等对这种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冯友兰提出抽象继承法 在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上，主要是围绕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展开讨论的。冯友兰在当时发表的文章《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中指出：“我们近来的哲学史工作，大概用的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把哲学史中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简单化、庸俗化了，使本来是内容丰富生动的哲学史，变成贫乏死板。”因为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不是属于奴隶主就是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他们的哲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样，中国古代哲学史净是应该抛弃的糟粕，还有什么可以继承的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冯友兰提出要区别哲学命题的两个方面意义，即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他说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是跟作这些命题的哲学家所处的具体的社会情况有直接关系的”，这是不能继承的，我们所能继承的只是它们的抽象意义。这就是著名的“抽象继承法”。

座谈会上，提出后，多数人不同意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洪谦、杨正典、汪子嵩、胡绳、艾思奇在发言中都指出，区分一般和特殊，不能作为继承遗产的标准。汪子嵩和杨正典指出，把一般和特殊加以割裂，等于承认有脱离特殊而独立存在的东西，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而这种继承，只意味着对旧东西的保留，而不是批判地改造。胡绳认为，判断一个事物有无阶级性，要从事物本身实质内容出发，如果事实上并没有超阶级的道德观念，而只是在头脑里想出一个超阶级的抽象的道德观念，并从而断定事实上有超阶级的道德，那只是非科学的抽象，这正是唯心主义观点的表现。艾思奇认为，如果按着冯友兰先生所提出的标准去继承，那么，一切抽象的东西都可继承下来，唯心主义哲学的一般的命题，也都可以继承下来，这样，在继承问题上，便抹煞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传统的差别。艾思奇的发言大家感到一般化，有青年学人说他“始终没有摆脱教条主义的气味”。参加会议的人对汪子嵩发言的态度感到不满，郑昕认为“像吵架”。卢育三认为“如果说会议有教训的话，这就是主要的教训，金先生冯先生都是全国知名的老学者，指名说：‘我提醒你注意……’，这成什么话。”对洪谦的发言，参加会的人也认为态度不好，是“对冯先生进行人身攻击”（东北人大助教吴锦东）。

会议哲学史料受重视 1957年5月10日至14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史研究室联合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工作会议在北京大学临湖轩举行。潘梓年宣布召开这次哲学工作会议的目的，并提出下列三个问题作为会议讨论的中心内容：

1.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2.中国哲学史目前进行研究的问题； 3.中国哲学史资料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朱谦之认为，中国哲学史是有它的特点和规律的。但是我们要寻找出它的规律，必须要一方面注意研究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方面要把中国哲学史当成世界哲学的一部分。因此研究中国哲学史，就应该而且必须注意西方哲学史、东方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冯契指出：哲学思想的一般规律，不但要从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还要从哲学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联系中去寻找。杨荣国认为：只有抓住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才能了解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和系统，这样才不至于失去哲学思想的本来面目。

对于第三个问题，潘梓年认为，我们中有一些人对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的很少，因此就容易犯教条主义的毛病。过去我们有一些人认为资料工作低于科

学研究工作，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一个人知识丰富与否，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决定于掌握资料的多寡。资料整理工作就是科学研究工作，整理出来的资料，也就是科学的成果。王维庭在发言中表示同意和支持潘梓年的意见。有人认为从事翻译古代典籍工作的人多了，岂不乱了吗？王说，不要怕乱怕多，相反的他认为多多益善。因为作品一多，就可以互相比较，好的自然流传下来，社会上是一定选择标准的。学说流传绝不能依仗政治势力的扶持，好的著作如杨子云的《太玄》，它是经久流传而不息的。吴则虞认为，中国哲学史资料工作中，有十项基本建设，即续经义考、子籍考、道藏总目提要、大藏经总目提要、传灯广录、中国思想家通谱、诸子证异、新子汇、补四朝学案、诸子文抄的十项工作。代表年轻一代哲学工作者发言的萧蓬父强调指出，对一些古典著作做简注的时候，注释尽量求得全面，考据方面不妨简略一些，这样是有助于初学的人学习的。此外他还建议做一些报刊资料索引工作，这样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掌握前人的工作成果，免得重蹈前人所犯错误的覆辙。

此次座谈会对于日丹诺夫对于哲学史教条主义定义的质疑，尽管昙花一现，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迹。1978年之后，日丹诺夫定义迅速失去市场，就得益于这次会议。此外，会议引发了大家对哲学史的兴趣。使得中外哲学史这两个分支学科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培育了众多的专业人才。5月的工作会议部署的中国哲学史的资料编辑工作，洪谦等先生提出的编译供初学者用的西方哲学史资料选编等主张，后来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这些工作的成果（如北大西方哲学史教研室选编的六本资料），哺育了几代学子。

4、短暂机遇期的一次全国性学术盛会——1957年北大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况追记与反思方 昕这些年，每到新春一月，我的一些当年的北大同学、同事和师长，见面时常不忘提及数十年前亲历的那次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我于1955年从中央组织部经全国统考进北大哲学系学习，1956年暑期之后经校方任命担任系秘书。在郑昕、汪子嵩先生领导下，亲历了那次会议从酝酿筹备到会务全过程。1957年1月，由北大哲学系发起的那次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学术讨论会，在刚刚经历过万马齐喑的年头，与会的老中青三代学人（应邀出席者120余人，前来旁听的北大及兄弟院校本科生、研究生近百人，另《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哲学研究》、《新建设》等媒体先后前来采访者十余人）多数人能够把自己想讲的观点基本上都讲出来，在当时确属难得。开在难得的短暂机遇期大家见面时，聊得最多的是，那个会从筹备到顺利举行，恰好处于一个短暂的机遇期：开早了，开不了；开晚了，开不成。这个转瞬即逝的机会恰好被抓住了。1956年前，全国性的批判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批电影《武训传》，批以俞平伯先生为代表的《红楼梦》研究学者；批胡适，从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到批判其“反动政治思想”，乃至批判其洋老师杜威等人；批梁漱溟；批胡风，从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开始，到批判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小集团，接着又牵引出一场震动全国、规模空前的“肃反”运动（大批中老年知识分子以及与他们往来较多的党政干部，乃至某些资深的高级干部如潘汉年、彭柏山等人都成了“肃反”对象，导致数以万计者被监禁、劳改终身）。致使高等学校沦为重灾区，消极影响重大、深远的还有历时数年的“院系调整”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高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当年根据政治需要按照苏联模式对全国高等学校动大手术，进行撤并改造重组，包括著名的燕京大学、东吴大学、朝阳大学在内的诸多高校被撤销。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被砍掉，众多的哲学系被撤掉，原有教师学生被调入北大，北大哲学系一度成为全国“只此一家”（直至1956年下半年起始陆续在几所高校恢复哲学系）。历时数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则是把从民国时期过来的高校老教师列为改造对象，毛泽东提出要求他们“脱裤子”、“割尾巴”，力求通过一次次自我批判和互相批判，肃清“资产阶级影响”。在此期间，各高校中许多资深的乃至国内外知名度颇高的老教师还被剥夺了上讲坛授课的权利。连续几年下来，一片肃杀之气充斥中国大学校园。物极必反。经过数年煎熬，终于迎来了春天（尽管这个春天过于短暂）。回顾历史，从1956年初至1957年夏初，可称为两个整肃期（毋庸讳言，后者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前者）之间的宽松期。至今，亲历者仍不忘津津乐道那个短暂而多彩的一个个令人目不暇接的横断面：1956年1月14日，由中共中央召开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党政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共1200多人参加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中南海隆重开幕。这一出乎意外的大型专题会议，在会前经过长时间的郑重筹备。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党政领导机关中对知识分子的种种宗派主义倾向，低估了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妨碍了知识分子作用的发挥。周恩来在报告中郑重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大会还向全国郑重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1月20日，毛泽东提出全党上下要把“关于知识分子一系列问题”加以全面解决，迎接全国文化建设的高潮。2月24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提出实施双百方针。他宣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人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发表各种意见”。5月26日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奉命在中南海怀仁堂向知识界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演讲，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有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自由。陆定一的演讲对双百方针作了详尽透彻的阐述，在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针对当时党内一些“左”派人士由于对双百方针不理解而发出的不谐言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2月27日、3月12日，针对知识界一些人的重重疑虑，毛泽东先后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和在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一再强调“双百方针是一个基本性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此外，毛泽东在这一年多的时间，还曾先后分别约请多位学术界有重要影响的知名人士在他的书房里谈心，听取他们关于发展学术事业的意见和建议，颇得好评。正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机遇期，为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在之前是想都不敢想的。抓住机遇，主动发起1956年的早春气候，在学术界许多知识分子的心里燃起了希望。尽管对于阅历沧桑、富有政治经验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来说仍将信将疑，但是大家普遍希望抓住当时有利时机，做些能够做、可以做的事，在推动学术发展、培养造就人才方面有所作为。北大哲学系部分老中年教师经过酝酿，打算从破除“日丹诺夫戒律”上打开缺口，在哲学领域突破坚冰，引导各种不同观点展开争鸣，举办一次学术讨论会的雏议开始形成。由中哲史、外哲史教研室引领，波及其他各教研室。以往，由于死守苏式教条，苏共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人日丹诺夫的一席讲话，竟长期束缚苏联、中国及东欧各国哲学界，大家不得越雷池一步，把丰富多彩的哲学发展史变成干巴巴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互相斗争，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对持有异议者动辄上升到政治问题加以讨伐、制裁。对此，大家早已忍无可忍。抨击乃至去除这一戒律，解放哲学界，乃学者们的共同心愿。用几千年丰富多彩的中国哲学发展的文明史，驳斥日氏戒律，去除此一枷锁，成为举办此次酝酿中的哲学讨论会的共识。而且众人一致主张“要开就开大的”，即开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邀请全国哲学界有志者共同参与，共议复兴哲学学术和哲学教育事业大计。为了避免审批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麻烦（开这样的会，可以说是1949年建国后中国哲学界第一次吃螃蟹，大家都小心翼翼），于是议定把会议的名称低调定为“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级领导的首肯和相关部门热情支持经与《人民日报》理论部负责人商妥，陆续在该报理论版发表数篇重头文章：郑昕先生的《开放唯心主义》，冯友兰先生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两个问题》，朱伯崑先生的《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文章刊登后，在学术界获得一致好评，有些读者致信报社编辑部，希望多多刊载类似有利于促进开展学术讨论的好文章。接着，与有关领导机关接洽，试探获准召开的可能性。第一步，请示校党委。党委书记江隆基同志对哲学系带头发起组织全国性学术会议大加称赞，并表示对上对外交涉如遇困难，学校党委可出面。同时指示学校各有关职能部门切实做好各方面的保障工作，确保会议圆满举行。对上对外交涉，没想到竟一路顺风。这当然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时任中宣部科学处（当时党中央各部门无局级设置，处即相当于现今各部门的司局）处长的于光远同志表示，开好这次会议，将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他还主动帮助与中宣部理论处、教育处等职能部门接洽，均获得支持。高教部政教司负责人也表示热情支持，还提出如有必要，可由他们向上级主管部门接洽以及向有关兄弟学校打招呼。这里还特别想提及当时在北大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任教员的严慰冰同志（陆定一部长夫人）。她是由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前身）某培训班毕业后分配来北大任教的，她和同事间相处很亲切，大家都称呼她严大姐或慰冰大姐。当我们提出请她就我们召开哲学学术研讨会一事在部长那里吹吹风，她当即满口答应，并很快有了回音。她说：对他来说这样求之不得的好事，哪能不支持呀！（至于后来“文革”中她遭受林彪、叶群之流丧失人性的恶毒摧残，北大同仁无不愤慨之极。）在同中央级相关各学术机构接洽中，都普遍获得这些单位领导同志的全力支持与赞许。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科院前身）副主任潘梓年同志（主任郭沫若先生为挂名，潘为实际主持人，并曾兼任哲学所所长）最为热情。当时我们曾数度提出由“学部”主办此次学术会议，均被其婉拒，他示意由你们北大出面最合适，学部及哲学所将全力支持，届时两机构主要学者和他本人都将莅会，并将通知准备与会人员在会前写作论文或发言稿。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胡绳同志对这次学术活动也表示高度关注和支持。除表示届时派出强大阵容参会外，还欣然允诺承担会议总结发言的重任。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顾锦屏等

多位资深专家，也都表示将以老朋友身份与会，参加切磋研讨。中共中央党校以艾思奇同志为首的数位资深哲学家都表示将集体与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人民大学……诸多兄弟院校的同行都表示在当时召开一次全国性哲学学术研讨会，贯彻双百方针，破除教条主义等绳索，是适时的、必要的。在忆及这次全国性哲学研讨会从酝酿、筹备到会议成功运行的全过程中，应当特别提及核心人物汪子嵩先生。子嵩先生在抗日战争烽火中，千里迢迢历经艰险从祖籍浙江奔赴地处西南边陲、举国闻名的西南联大。在联大，他一面师从希腊哲学研究专家陈康先生刻苦攻读希腊哲学，颇受陈先生赏识；一面热心参加救亡运动。在参加中共地下党之后，他成为当地学界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群众运动的活跃分子。抗战胜利后北大返京，在经过院系调整之后的北大哲学系，子嵩先生受命主持系务日常工作，担任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同时担任北大校党委委员）。此时，他毅然放下热衷的希腊哲学研究，全身心投入率领全系师生为办好当时全国唯一幸存的哲学系竭尽全力。他一方面做好来自七八所兄弟院校教师的思想稳定和关系协调工作，与他们做知心朋友；一面在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尽可能保护被触及的教师，减轻政治压力。同时对被剥夺授课权利的教师，尽可能采取补救措施，如安排他们开设若干专题讲座和某些专门化课程，组织编辑或编译中外哲学思想史料，参与中央编译局委托的某些经典文献的翻译和咨询服务。在他的多方努力下，还有几位知名的北大哲学系学者应聘担任《人民日报》学术顾问等等，使他们不致被边缘化而荒废业务，为日后中国哲学教育的恢复发展储备至关重要的师资资源。因此，在酝酿组织此次学术讨论会过程中，他自然成为组织大家多方谋划的关键人物。此外，他在校外学术界及诸多中央党政机关具有广泛与良好的人际关系，平时即经常邀请诸多一流学者来校演讲或授课，每请必到。这就为促成此次学术研讨会的梦想成真提供了必备的外部条件。自由争辩精神贯穿会议全过程在经过较为充分的酝酿和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的基础上，座谈会于1957年1月22日如期在北大举行。由郑昕、潘梓年、何思敬轮流主持。来自四面八方的哲学界旧友新朋，欢聚一堂，其乐融融。大家共同怀抱通过敞开心扉，自由争辩，取得共识，力求在排除对哲学学术研究和哲学教育事业严重干扰的教条主义和诸多不恰当的政治干预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把“双百方针”从口头上、字面上落到实处，以繁荣哲学学术和哲学教育事业，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迫切需要。与会的老中青三代学人，大多数人都能借参与这一开国以来首次大型学术研讨会的机会，把自己积攒心中多时想说的话说出来，一次说不完，再三再四陈述。对不同的意见，据理力争，却很少出现扣帽子，强加于人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泰斗式人物冯友兰、贺麟、朱光潜、金岳霖等人的发言，都具有一定的深度，对引起争辩的问题，一再申明自己的观点，在整个几天研讨中，起了引领的作用。在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张岱年、任继愈、洪谦、陈修斋、朱伯崑、张恒寿等的高质量发言，吸引与会者的关注，形成一次次精彩的场面。个别“左”派人物（如关锋、孙定国）在当时的氛围下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实在按捺不住时甩出几句如“修正主义”之类扣政治帽子的言辞，但颇不得人心。也有少数与会者曾因此而迟疑却步，这不过是支流而已。会议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是如何对待唯心主义哲学。与会大多数人认为过去几年对待唯心主义的批判乃至声讨，固然受国际的影响，与“以苏为师”，照抄照搬洋教条有关，但是政治的介入，动用党政权力，干预本属学术领域的争论，甚至涉及对人的使用、升迁，极端的情形发展到从舆论的讨伐问罪到使用司法等极端手段，剥夺学者的人身自由。这些粗暴行径不仅大大超出学术争议范围，且构成严重违法违宪行为。在党中央大力提倡实行“双百方针”的今天，有必要彻底扭转以往的错误行径，纠正既往一切错误举措，追究违纪违法者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使“双百方针”从众人将信将疑转化为深信不疑，做到取信于民。就学术而论，众多学者认为，历史上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哲学是共生的现象，两者之间有争论，有时还很激烈，但不存在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问题，而且往往还有吸收对方长处充实自己情形。平时，我们课堂上不是常讲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吗？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创立唯物辩证的新型哲学，不是曾经拜先辈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等许多人为师，从他们的哲学思想中吸取有益成分加以利用、改造的吗？为什么发展到今天，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自居的学者竟数典忘祖了呢？！中心议题是反对哲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许多人在发言中一致认为当时影响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倾向是教条主义。除了国际版的日丹诺夫戒律外，国内版的教条主义者除利用国际版的余威兴风作浪，他们还往往利用政治上掌握一定权力的优势，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自居，颐指气使，对经历民国时期特别是留学欧美归来的老一代哲学家，一概否定，在历次运动中把他们作为靶子。因此，此类教条主义者他们身上兼具专制主义气息。所以当年人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也不能不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专制主义，此次会议也不例外。会上也有一些老知识分子心存余悸，惟恐有朝一日遭到反攻倒算。在上述复杂心态支配下，此次座谈会上的批

判教条主义和专制主义，只能说是小试锋芒，不甘缄默又适可而止是当时多数人的战术。但总体来说，这是一次以知识界为主体，初试锋芒，反击曾经盛行一时的教条主义、专制主义的一次盛会。它同1956年在青岛举行的自然科学界关于遗传学的全国性大型座谈会，共同构成那个年代留给人们的两道相互辉映的靓丽风景。人们对于当年的勇敢者们一直是怀有深深敬仰之情的。几点遐想几十年岁月过去了，当年北大中哲史座谈会的与会者以及当时关注此次学术会议的人们，就如何评价此次学术会议以及与此会有关的一些问题，如为什么会出现那段短暂的宽松期，双百方针的提出及实施期为何如此短暂，乃至对这一方针本身置评等等，可谓众说纷纭。关于此次学术座谈会的评价，上一节已作简略述评，不赘。关于1956年初至1957年夏初那一段短暂的宽松期，应当说是国内、国际诸多因素促成的。诸如之前数年运动连绵不绝，特别是院系调整及相伴随的思想改造运动以及随后的“肃反”运动，对知识分子阶层伤害深重，为社会稳定起见亟需休养生息。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也须营造宽松气氛。苏共二十大的召开，赫鲁晓夫做反斯大林秘密报告，苏国内局势不稳，东欧波匈事件频发和扩散等等，都可能对国内政局造成不利影响。故有必要从安定知识阶层入手，营造国内宽松环境，以防患于未然。然而，人算不如天算。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公开号召全国公众大鸣大放帮助执政党整风。一时间各种批评建议喷薄而出，尽管绝大部分都出于善意，但因有些话题涉及敏感政治问题，致使当局惟恐失控，于是，风向陡变。6月中旬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席卷全国，短暂的宽松期结束，高等学校成了反右派运动的重灾区。中哲史座谈会的有些参与者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有些人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违心的检讨，以求侥幸过关。有些人在“文革”中再次受到更加严厉的清算，使他们遭遇灭顶之灾。对于当年怀疑双百方针是圈套者，似可说是一语中讖。关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当年提出双百方针的根由，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我的同窗赵修义近期在《不该被湮没的一次“百家争鸣”的尝试》的长文中，把对于苏共长期在思想文化乃至国民经济领域中推行教条主义的严重弊端引以为戒之说，应是可信的。至于涉及提出者主观上有无蓄意应用“钓鱼术”之说（有人曾将当时一再提出双百方针是随后反右运动中应用“引蛇出洞”的“钓鱼术”的一次预演），因求证之难，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以为存疑似更为稳妥。关于双百方针本身，与当年提出者的主观意向，应视为两回事。提出并实施双百方针，无论中外，均有悠久历史，其正面效应，有众多史实为鉴。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解放学说出发，实现所有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乃未来社会的终极目标。因此，双百方针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的方针是肯定无疑的。应作为全世界共产党人之为之共同奋斗的一个目标。当然，在现实世界中切切实实地贯彻实施这一方针，需要具备一定的物质的和文化的条件，尚需要我们大家为创造这些条件做出不懈地努力。至此，笔者还拟稍加引申，就有关的两点遐想作简略申述。一是如果破除意识形态的制约，唯心主义哲学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就很容易呈现在我们面前。近几个世纪，一个个大国轮番崛起，交替称雄于世。这些国家的强盛，固然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分不开的，人们稍加推究，即不难发现，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哲学也功不可没。比如，唯心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大行其道，推动国民教育的发达，科学技术进步在全球后来居上，对于美利坚合众国于20世纪迅速取代大英帝国称霸全球，深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并未致美国于一蹶不振。而百余年来，美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却难有作为。由此可见，主张唯物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相互学习，各取对方之所长，对于推动各派哲学的发展，各自社会功能的发挥，是有益无害的。二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影响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其主要领导人正是之后的中共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德先生和赛先生一时誉满全国。追求民主与科学者不限于学界，其在新兴工人阶级、商界乃至若干政界人物中均有重大影响。之后，在当时的联共（布）操纵的共产国际主导中共早年的活动开始，苏联模式对早期的中共起支配作用。于是，“五四”时期以民主与科学为标志的启蒙运动中止。自此，搬用苏联模式长达数十年之久。即使上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之后，“苏式”后遗症仍纠缠中国不止。甚消极影响，概而言之，即疏远德先生、赛先生，遗害巨大。经济建设方面，虽成就显赫，但失误过多，代价高昂，成效难如民意。虽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但人均GDP仅及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的10%不到。而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的严重滞后，更为国家的未来发展积累众多待解的重大问题。百余年前，马克思即曾一再昭示世人：哲学不仅用于说明世界，更是用来改造世界。哲学，向来就不纯是“书生空议论”，笔墨官司。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之路怎么走？当前诸多重大难题如何破解？中国国运如何进一步振兴，乃至引导世界尽快走出当前由美欧引发的又一次全球性超级危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大有用武之地。只要能够牢记经验教训，不再重复教条主义，面向实际，正视现实，深信不会令世人失望。

5、1949年后，如果要我们挑出5个最不能让人忘怀的年份，那一定就会有1957；但如果要我们挑出50个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的事件，恐怕没有谁会想到1957年1月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发起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被遗忘的哲学史座谈会 前些日子，10月27日，笔者参加了北大哲学系百年系庆，也只在李四龙编著的《有哲学门以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2-2012》（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10月版）中看到了这么短短的一段话：“1957年全国高校先是经历了空前的思想活跃，又受疾风暴雨式的批判。1月22日-26日，北大哲学系主办‘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与会代表有哲学系教师和中国科学院哲学所、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有关专家学者，共100余人。会议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与会者畅所欲言，主要讨论：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中国哲学史的对象与范围、中国哲学的遗产继承问题。贺麟、陈修斋在会上做了主要发言，提出唯心主义也有好的和进步的东西；冯友兰提出‘抽象继承法’，即哲学命题有抽象意义与具体意义，抽象意义没有阶级性，是可以继承的。”放在我面前的这本《守道1957》上记录的，就是这样一些在当时的中国最能提出哲学问题的思想家们在讨论中的发言与所写的文章。

哲学家为何不谈哲学问题 我一篇一篇读着，心中五味杂陈：为什么完全不是哲学问题的问题会成为这些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为什么就是提出这样一些问题也让他们心惊胆战，必须在最后的“附录”或“说明”中给自己留有余地？能不能不说话？不行，也不会，因为终于有了这样一个可以让你“百家争鸣，畅所欲言”的机会；而且冯友兰先生还专门著文驳斥了各种怀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言论（发表在1957年3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他说，他自己就参加了另一个会议，亲耳听到了毛主席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更多指示，这怎么会是假的呢？果然，1957年4月18日，毛泽东就在自己的住所接见了周谷城、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胡绳等人，说，“你们这些教授被搞苦了”，还专门对冯友兰说，“你们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还应继续下去。”（参见《有哲学门以来》第110页）。风云突变发生在1957年的6月8日，在此之前的4月18日及更早的时间，这些教授们至少是想把一些久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的。而这些话，合情合理地就不大会是一些真正的“哲学问题”，因为还来不及，也没有那样的环境与气氛。有些人问：“我们为什么还没有看见伟大的作品与著作？”冯先生说：因为“百家争鸣”的政策提出来还不到一年，“在短时期内，怎么会有伟大的著作出来？就是抄也恐怕来不及。”（《守道1957》第33页）反驳得很有力。但真的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吗？争论一些今天看来无需争论的问题，而不去深思那些真正的哲学问题，其实就是他们在当时觉得不得不或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郑昕在《开放唯心主义》中就真情实意地解释了自己思想的转变，说明自己为什么会从一个康德哲学的研究专家成为了一个在只倡导“开放唯心主义”的呼吁者。他说，解放后国家的盛况，使我不得不佩服指导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觉得康德哲学无用。从意识到“康德无用”到“政治取代了哲学”，害怕接触任何唯心主义，其实也就变成了“政治上的唯物主义”和“学术上的唯心主义”。怎么样才能真正战胜学术上的唯心主义呢？那就要在学校里给学生们开设唯心主义的课，就要读唯心主义的著作，“为着最后战胜唯心主义，就要深入地研究唯心主义”。就连在学校开不开唯心主义的课，在当时也已经成了一个其大无比的问题，可见起点之低，居心之委婉。

唯物唯心非红即白 这种“委婉”，其实很容易就可以被理解为“狡猾”。果然，“原则性问题”很快被提出来了。关于哲学史的“科学定义”，也就是日丹诺夫的定义：“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的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同上，第140页）许多老一辈的哲学家都反复表示自己完全赞成日丹诺夫有关哲学史的定义。直到1978年，当笔者开始研读外国哲学史时，我的导师陈修斋先生还一再提及日丹诺夫的定义，并让我们反复讨论这一问题；而在当时，他却是很少对这一定义持有异议的学者之一。正是他对这次会议最后给出的结论（“唯心主义作为唯心主义，总是绝对错误的，也不能说唯心主义本身对人类认识的发展有什么积极的贡献，否则就会模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该书第224页）提出了异议，认为“有些本身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也可能是合理的，有价值的”，它的合理与价值并不在于能促进唯物主义的发展，或包含唯物主义的成分，而在于唯心主义作为唯心主义，本身就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参见陈修斋《关于对唯心主义的估价问题的一些意见》）。这可能是这次会议上最为“大胆”的言论之一，另一更为“大胆”的说法是汪毅先生提出来的，他竟然敢公开说“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西方哲学评价的标准来要求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是不切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同上，第98页）关锋对冯友兰、贺麟的反驳也不能说没有力量：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敌对的，其界限是分明的。因为第一，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通常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第二，我们谈的不是个别唯心主义者与唯物主义者的关系，而是两条不同的路线的斗争，所

以它们之间也就不是“青”“蓝”关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马克思与黑格尔）而是“红”“白”关系（两种绝然相反的色调）。总之，“如果我们在研究哲学史的方法论上，稍微向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界限的方向挪动一步，那么，我们的哲学史工作也要走入绝境。”（同上，第216页）多么断然的语气！今天能回答得了吗？然而，当中国的老朋友，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 1873-1966）几番来信询问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你们是如何界定与唯物主义相对唯心主义？”时，所有这三位通信者均未做出正面回答，只说“什么是唯心主义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作中已经做出了清晰的、明确的回答，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没有特别的补充。”（同上，第664页）在霍金看来，北京大学开课讲授唯心主义的代表黑格尔和罗素的哲学；但罗素通常与黑格尔是对立的，说黑格尔哲学是唯心主义他能接受（他还不知道唯心主义在我们这里就代表着反动、落后、衰亡），但为什么说罗素也是唯心主义者呢（他并不知道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哲学家在我们看来都是唯心主义者）？他只知道许多无谓的学术争论都是由于语言意义的混乱造成的，但他还不明白任何语言意义的混乱在某些人看来，都是由于阶级立场的混乱造成的。冯友兰先生在发言中说：孔子说“天何言哉”，是不是只要他说了“天”而又未说明“天”是物质的东西，我们就说他是唯心主义者？那么，作为唯物主义的荀子在他的《赋篇》中也说道：“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危为安，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为其同！”是不是仅仅因为他在这里用了“上天”而又未说明“上天”是物质世界，我们就也要说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呢（同上，第45页）？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回答的。但如此简单的问题是如何成为一个问题的？我们今天能回答得了吗？陈家琪

背景 1957年1月、5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发起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这是30年间唯一一次名家荟萃，老中青学者参与，气氛活跃，畅所欲言又向全社会广泛传播的一次学术会议，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再也没能重现。冯友兰、贺麟、金岳霖、胡绳、潘梓年、于光远、艾思奇、朱谦之、朱光潜、金克木、何思敬、侯外庐、吕振羽等著名学者都与会。不仅如此，两次座谈会议引发了大家对哲学史的兴趣。5月的工作会议部署的中国哲学史的资料编辑工作，洪谦等先生提出的编译供初学者用的西方哲学史资料选编等主张，后来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这些工作的成果（如北大西方哲学史教研室选编的六本资料），哺育了几代学子。1957年夏季风云突变之后，这次会议就遭到了清算。

章节试读

1、《守道1957》的笔记-第659页

Y. T. Mei应作Y. P. Mei (梅贻宝)

1957年4月4日，哲学家唐君毅（1909-1978）在波士顿访学时，曾与美国唯心论巨子霍金（William Ernest Hocking, 1873-1966）晤谈两小时。霍金当时拿出他写给中共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讨论思想自由和唯心论的信，以及金岳霖的回信，向唐君毅咨询。林伟先生去年在哈佛大学档案馆霍金档案中找到了金岳霖的那封回信，拍下照片后传给我。我根据他提供的照片和其他一些资料，在《上海书评》第117期（2012.3.4.）发表了一篇《“金岳霖之回信”说了什么》，将金岳霖的回信首次翻译刊布出来。《上海书评》第118期（2012.3.11）还刊登了李海默先生的一篇回应文章《补记Hocking二三事》。

我写那篇文章主要是从唐君毅入手，由于未见到霍金写给陆定一的信，所以并不十分清楚这个事件的直接起因。后来在同事刘新文先生的提醒下，读到华东师大哲学系顾红亮教授的论文《“你们如何界定唯心主义？”——记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的几则通信》（《哲学分析》第3卷第3期，2012年6月，第43-51页），我才知道霍金写信的直接背景是1956年毛泽东“双百方针”的提出，陆定一所作《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报告，以及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增设唯心论课程等事件。由于这些背景性事件同1957年1月由北大哲学系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有着直接的联系，所以顾教授的论文也被收进上个月出版的《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赵修义和张翼星等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一版，第659-675页），同时还附上了霍金与陆定一、潘梓年、金岳霖来往信件的原文和译文。《上海书评》第215期（2012.12.16）还刊发了对《守道1957》的编者赵修义先生的访谈。

顾教授的论文中提到一位叫Y. T. Mei的先生，霍金与唐君毅座谈时，此人也在场，但顾教授没能将他的本尊辨认出来。这个问题其实不难解决，我先引几段顾教授本人的话：

第四个材料为一则笔记，是1957年4月4日霍金与Y. T. Mei、唐君毅的谈话记录，其内容涉及潘梓年、金岳霖致霍金的信，该笔记为打印稿，一页纸。……

我在哈佛大学档案馆所藏的霍金通信档案中见到霍金的一页笔记，该笔记记载，1957年4月4日，霍金把潘梓年和金岳霖的回信给来访的Y. T. Mei和唐君毅看，询问他们潘梓年和金岳霖在回信中表达的善意是否真诚。Y. T. Mei和唐君毅都认为此信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粉饰”，但仍有几分诚意。…

这则记录还说，Y. T. Mei认识这两位写信者，潘梓年是一位党员，通常站在党的立场上说话；金岳霖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和学者，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折磨。……

Y. T. Mei和唐君毅还指出，霍金的《哲学大纲》中译本在中国相当有名，潘梓年和金岳霖估计也知道此书，建议霍金不必寄书给他们。

这位参加霍金和唐君毅座谈的Y. T. Mei先生，根据我在《“金岳霖之回信”说了什么》一文中引用的《唐君毅日记》和唐君毅致谢廷光书，只能是时任爱荷华大学东方学教授的著名哲学家梅贻宝（1900-1997；他是梅贻琦的弟弟）。梅贻宝姓名的拉丁字拼法是Yi-pao Mei或Y. P. Mei，霍金笔记打印稿中的Y. T. Mei显然是Y. P. Mei的误打。翻检梅贻宝的《大学教育五十年——八十自传》（台北市：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3月第一版），发现他曾于1927年春在哈佛大学旁听过怀特海和霍金的课（第37页），同霍金本来就有师生关系。唯一可惜的是，梅贻宝在他的自传中没有记述他参加霍金和唐君毅座谈这件事。

2、《守道1957》的笔记-第5页

宣布一个哲学思想是错误的，并不等于制服它----恩格斯

《守道1957》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